

## 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

耿昇

**[摘要]** 16—18世紀，“廣州—澳門”是中西關係和中西貿易的前哨港和目的地。以“廣州—澳門”市場為核心的亞歐美貿易，白銀既是一種貨幣單位和結算手段，也是一種商品，形成了在中西貿易上重要的“白銀貿易”，最終推動建立了事實上的中西貿易的“銀本位制”體系，催生並發展了國際貨幣的白銀化或全球化。這一過程使中國商品不斷被推向歐美市場，也加速了西學東漸，使中國逐漸接受西來之風，步入了近代社會的征程。

**[關鍵詞]** 白銀 廣州外貿 貨幣白銀化 貿易國際化

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於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15至18世紀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中，指出14—18世紀歐洲的經濟、貿易、文明和社會發展，完全是以地處歐亞非三個大陸匯合處的地中海為中心而展開的，“地中海文明”又是環地中海國家之間的、與外部世界經濟文化和政治交流而形成的“多元文明”，故“歐洲文明”也可以稱作“地中海文明”。1991年，法國漢學家與東南亞史學家龍巴爾（Denys Lombard，1938—1998）推出三卷本代表作《爪哇，十字路口》（*Le Carrefour Javanais*），認為南中國海或南洋應被準確地定性為“東南亞的地中海”。爪哇在東南亞扮演了一個類似地中海在歐亞非交界處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印度、伊斯蘭教地區和歐洲列強的勢力都曾匯聚並影響這一地區，從而使南中國海形成一個文化熔爐性的經貿大都會。

但筆者認為，16—18世紀南中國海的世界貿易和其他交流，應該是圍繞着“廣州—澳門”的貿易為中心的，無論是從商品的數量還是從其價值上，都應一概如此。更為重要的是，“廣州—澳門”與亞洲、歐洲、美洲之間的貿易，其結算和支付手段，大都使用白銀，包括銀錠、銀圓和白銀兌票，形成了事實上的中西貿易“銀本位制”體系。中西雙方貿易的興盛與萎縮，都與白銀庫存量或白銀危機有關。中歐雙方從事貿易的一大目的，就是賺取白銀；白銀充足之後，再用以

擴大雙方的貿易。白銀連接起東亞（特別是中國）與歐美的遠程貿易，使亞歐美三大洲的命運榮枯共享、休戚相關。歐洲（特別是西班牙）掠奪西屬美洲的目的，是為了得到那裏豐富的白銀蘊藏。歐洲對廣州的貿易從大逆差變成大順差，中國白銀從大入超到大出超，其關鍵商品就是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向中國輸入的鴉片。換言之，在16—18世紀的“廣州—澳門”貿易中，白銀既是一種貨幣單位和結算手段，也是一種商品，形成了在中西貿易上重要的“白銀貿易”。

## 一、英國開拓海外市場與中英白銀交易

16—18世紀，英國要替其產品在亞洲尋找出路，此段歷史肯定比東印度公司的成立還要早得多。英國人從17世紀初開始便想將其貿易從傳統的東方（Levant，利凡得）擴大到遠東最遙遠的區域，他們相信，英國毛織品銷售的遼闊範圍以及政府配發的特許證，必然會導致龐大的商品出口。英國東印度公司初期的運作便如同世界上的所有商貿公司一樣——為國家提供財政支持以換取特殊權益。東印度公司由此而成為因製造業一舉蹶起的英國與歷史悠久的農業中國之間相會的媒體或中介，而就本質上來說，這應屬一種互惠互利的交流。

中國茶葉在英國和西方的高層沙龍乃至勞動大眾中都頗受歡迎，工業革命也使英國產品在中國民眾中受到高度珍視。這種“交換契約”的意義不僅能大幅增加雙方的國稅收入，而且也能延續東印度公司的發展命運，英國遠距離國際貿易政策的基礎便是確保該公司能控制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和中藥市場，這就賦予了英國工業一種佔領中國市場的手段。

中英之間的這種互相擴大貿易的願望，終於在1792—1793年間同時地在雙方爆發。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於1792年9月從朴茨茅斯港（Portsmouth）出發使華，次年8月到達北京——當然，該使團主要代表英國政府而不是代表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談判，其目的也不在於解決英國北方勢力對廣州某些衝突事件的操縱，而是要開闢“北京—天津”一線的中英貿易市場，打破由廣州行商壟斷中國對外貿易的局面。<sup>①</sup>英國還想中國開放其他港口，在英國製造商與中國運銷商之間建立直接聯繫，使英國人通過這些港口控制中國沿海貿易，然後再逐漸滲透至中國內地市場，從而提前四十年勾勒出19世紀工業製造商帝國的雛形。

國際貿易必然需要大量周轉資金，儘管當時在世界範圍內已發行了紙幣，但在金本位或銀本位的體制下，金銀始終是國際最流通的硬通貨。紙幣的發行量與行情，大都決定於金銀的儲備量與行市。18世紀紙幣的發行並未撼動白銀貨幣的主導地位，白銀仍然是牽動國際商業市場的重要因素。英國海外市場，特別是東亞市場的開闢，始終是以白銀交易為後盾。

由於早期的中國物產豐富、自給自足，西方沒有多少可供中國採購的商品，故西方在無法支付從中國購買大量商品的銀價時，才向中國輸入鴉片以榨取白銀。在傳統上，中國是一個白銀進口大國，清後期的鴉片走私顛覆了國家曾經贏利數百倍的貿易平衡。後來，在印度瑪爾瓦（Malwa）毒品連續降價的拖拉下，鴉片已不再是富人的一種奢靡享受，而開始在民間所有階層

<sup>①</sup> 當該使團離華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正處於蓬勃發展時期，但英國卻利用修改東印度公司憲章的機會，發動一場大辯論，內容主要在於是否允許東印度公司繼續壟斷東方貿易，特別是輸往印度和中國的大宗出口商品，然而結果還是肯定的，1793年4月，東印度公司又獲許將其在遠東從事貿易的特權再延長二十年。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p. 1203-1204.

中肆虐，再加上中國本土罌粟種植業（特別是在中國福建、浙江、廣東和雲南諸省）的發展，情況每況愈下。終於，清朝皇帝於1830年頒佈的禁煙令，但根本無法阻止鴉片的秘密走私和進口，而這實際上是清朝人力和物力向典型非經濟目的之一種轉向。不過，我們尚不能具體評估鴉片在個人和集體收入中的比重，也完全不知道鴉片消費的地理和社會分佈範疇，以及其零售價格。

據亞歷山大·馬西森（Alexandre Matheson）1847年11月的一封信透露，<sup>①</sup>鴉片很可能是於1827年被引入雲南種植的，後來又被前往交趾支那學習印度種煙技術的華人傳入貴州和陝西等省份，此外，中國的鴉片種植又受到1840—1846年禁煙運動的刺激而逆勢增長——這場運動本來是為了斬斷來自印度的鴉片供貨的，但其結果卻為當地的鴉片生產拓展出發展空間。從基本估計情況來看，中國在1822—1827年間共耗資940萬銀圓來進口鴉片，在1828—1833年間共耗費1,330萬銀圓。按照當時每3個銀圓可購一擔大米的市價，1,330萬銀圓便折合300—400萬擔大米，但940—1,330萬銀圓只是中國進口鴉片時的價格，由廣東批發商進口後，鴉片經過許多中間環節和反覆加工精煉，其價格已經大幅提高。這樣算來，這一時期中國人所消費的鴉片市值可能最終相當於3,300—4,300萬擔大米，約等於或高於當時國家糧倉中的全部庫存糧。

中國人大量吸食和進口鴉片必然會造成國家白銀外流，導致清政府的白銀危機。一方面影響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國計民生，另一方面又使西方利用來自中國的白銀來促進世界白銀流通與貿易發展。中國的白銀本來大都來自世界貿易市場，其後又回流到世界白銀流動市場中。

## 二、清王朝白銀的輸入輸出及世界白銀產量

中國自鴉片輸入後淪為白銀外流大國，但其實中國白銀外流在此之前就已形成規模。早於1800年，中國有50萬銀圓流向印度加爾各答。1807—1809年，更是接二連三地有成批的白銀外流，主要輸往孟加拉和馬德拉斯，總共在680萬元銀圓左右。1810和1811年，又分別有1,402,461和1,158,680銀圓流向倫敦。在五年間，中國共有940萬銀圓的白銀外流。<sup>②</sup>

然而，無論如何，正是鴉片的進口，才真正地使中國從白銀的純輸入國逆轉為白銀的純流出國。鴉片要在中國白銀流向逆轉中負極大的責任。中國白銀的大量外流從1822—1827年的270萬銀圓增到1833—1834年的550萬銀圓，與此同時，鴉片的進口價值也從1822—1827年的730萬銀圓增至1833—1834年的1,310萬銀圓，其數量也從1817—1825年的6,819箱鴉片猛增到1828—1833年的16,684箱。<sup>③</sup>為了應對進口鴉片的增加，中國很早便在廣州就地利用豐富的儲備金來支付，那裏始終有充足的白銀供採購鴉片。

根據馬士（H. B. Morse）的記載（表1），在1817—1840年的24年間，中國的外貿逆差達39,351,798銀圓（折合28,333,294兩白銀），直到1825年，貿易的平衡才稍稍有利於中國，收入計在每年520—660萬銀圓之間，甚至在1818年達到了730萬銀圓。中國白銀的流出一般均徘徊在

① 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中國的沿海貿易與外交》），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47.

② H. B. Morse（馬士），*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 2,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352; Vol. 3, pp. 56-58.

③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p. 744-746, 772.

1820年的140萬銀圓到1825年的430萬銀圓之間；其中最大的浮動是從1818年的600萬銀圓，到1822年僅有的234,600銀圓。

從1826年起，形勢發生逆轉，中國進口驟降，於1826—1833年間暴跌六分之五，後於1834—1840年間又跌落近半。中國白銀進口每年差距巨大，從1827年的最多240萬銀圓到1830年的255,355萬銀圓。另一方面，中國白銀的外流量卻大增，在1817—1825、1826—1883年間平均增長近一倍，保持在400—670萬銀圓之間。只有在1839—1840年間，在林則徐於廣州實施新政的影響下，中國的白銀外流才減少至190—370萬銀圓。因此，中國白銀的傳統流向幾乎完全逆轉。在1826—1840年間，中國白銀外流達80,297,701銀圓，而只勉強收入12,327,209銀圓，也就是說，中國在15年間一共損失67,970,492銀圓。當然，這一數字本身只能是約估。如果考慮到中國在1719—1833年間共進口30,633,000銀圓，再加上從“墨西哥—菲律賓”進口的銀圓，總計約5億。因此，此時銀圓損失高達近6.8億左右。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中國在100年內將會失去它在150年間所賺取的全部白銀收入。<sup>①</sup>

表1 中國的白銀進出及鴉片進口情況（單位：銀圓）

	中國的白銀總量		平均量		中國鴉片的進品量
	進口總量	出口總量	年均進口量	年均出口量	鴉片
1817—1825	53,201,860	24,583,166	5,911,318	2,731,436	7,326,743
1826—1833	8,568,957	44,077,885	1,071,120	5,509,735	13,134,713
1834—1840	3,758,252	36,219,816	536,893	5,174,259	/
總計	65,529,069	104,880,867	/	/	/

資料來源：根據馬士（H. B. Morse）的資料所作的計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和第4卷。轉引自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1341.

英使馬戛爾尼1794年就已經預見到中國白銀即將大量外流，但他並未將鴉片的輸入作為原因，他說：

中國人在與荷蘭人、法國人、丹麥人、瑞典人、美國人進行貿易，他們至此之前一直從中獲得了筆巨額的順差，後來卻跌落為零。但他們與我們（英國人）的交易卻在繼續發展，使人覺得一切都充滿着希望和前途。這就是說，如果英國與中國之間的進出口還基本上保持平衡的話，那麼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則偏於有利於印度一方。中國人難道不會非常警覺地發現，如此之多的白銀卻根據貿易平衡條例而流出國門之外，當地方政權再無資源向歐洲證券市場投資時，它們便像過去一樣依賴於來自廣州的商業貨艙……<sup>②</sup>

歐洲白銀現金數額的急劇增加已由下列事實所證實：東印度公司很久以來便不再需要把棉花或鴉片個體進口商的資金打納入到自己的賬戶中，而是同意給予很高的兌率進行兌換。自1760

<sup>①</sup>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p. 744-746, 754, 1341.

<sup>②</sup> Cranmer-Byng（克蘭梅-比茵），*An Embassy to China*（《出使中國》），Longmans, 1962, p. 263. 本譯文由作者自行翻譯。

年代以來，倫敦市場上的匯票行情經常被確定在每個銀圓兌換5先令，也就是大大在平價兌率之上了。<sup>①</sup>到了1763和1772年，90天即付活期票據達到了每個銀圓5先令6便士，利息實際上達到40%。在平常情況下，365天的即付活期票據的利息保持在5先令1便士至5先令6便士之間，也就是在1.66—10%之間，這實際上是為了將來自中國的白銀收納到國庫中。在1830—1833年間，中國每年向英國輸出白銀15,570—1,910,936銀圓，總額為4,596,682銀圓。<sup>②</sup>

對於這種現象，學界至今所作出的解釋都不太令人信服，特別是我們未能掌握中國輸出白銀價值與進口商品價值的順差之間的任何對應關係。在1817—1825年間，中國白銀進口平均增長到25,016,448—220,886,951銀圓之間，其結存共達2,927,753銀圓。中國白銀的出口當時為2,731,436銀圓，但到1826—1833年之間卻猛增到5,509,735銀圓。中國進口白銀為26,340,696—23,998,153銀圓，其中有23,998,153銀圓返銷，這樣一來就留下了2,342,810銀圓的差距。<sup>③</sup>

參考東印度公司輸往廣州的白銀價格表（表2），可知英國羊毛織品於1785—1827年間便佔了全部輸華歐洲商品的81.9—82.22%，最多時在1807—1813年間，高達91%；但白銀的交易量卻只佔歐洲總數的4—8%或9%，僅在1792—1798年間曾達到過16%。因此，這個時期中英貿易的真正基礎是羊毛織品，它成了英國進口中國茶葉的經濟支柱，完全扭轉了早期白銀交易的趨勢，但毛織品交易仍使英國人賺到了巨額中國白銀，進而使他們更大數量地採購中國商品。美國人從1817年起也轉向了輸往中國的毛織品交易，而且他們在1821—1832年的12年間，總共向廣州出售了價值6,140,574兩白銀的毛織品。這總體上代表着每年平均有511,714兩白銀的交易，但它也只佔英國廣州對華出售商品中的27%，或者是佔西方對華出口總額（21,878,790兩白銀）的28%。

表2 東印度公司輸往廣州商品的白銀價格表

	每年的平均數（單位：兩／白銀）						
	白銀	毛織品	金屬	歐洲商品總數	歐洲總數	印度商品	總數
1763—1769	993,405	249,321	78,553	356,393	1,349,798	187,186	1,536,984
1770—1777	370,954	315,060	33,947	349,007	699,961	204,381	904,342
1778—1784	17,280	385,318	30,979	440,520	457,800	49,672	507,472
1785—1791	1,383,079	950,493	180,374	1,159,671	2,542,750	111,548	2,654,298
1792—1798	369,692	1,569,960	320,063	1,890,023	2,259,715	76,574	2,315,568
1799—1806	550,726	2,702,000	268,753	2,974,500	3,525,226	258,468	3,783,694
1807—1813	19,542	2,880,307	240,615	3,140,458	3,160,000	827,623	3,987,623
1814—1820	856,961	2,143,555	153,156	2,324,166	3,181,127	1,168,046	4,349,173
1821—1827	122,852	1,997,740	201,529	2,283,727	2,406,579	1,363,708	3,770,287
1828—1833	16,080	1,800,383	203,056	2,294,214	2,310,294	1,186,394	3,496,688

資料來源：詳見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全書拾檢；E·H·Pritchard（普里察德），*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17-18 Centuries*（《17—18世紀的中英關係史》）（Urbana, 1929）中的詳細統計數字。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1220.

- ①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763.
- ②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p. 753-757.
- ③ H. B. Morse（馬士），*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 4,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p. 222-344.

擅長於皮貨生產和交易的俄羅斯人，於1823—1837年間便通過恰克圖（Кяхта）向中國傾銷折合21,208,479盧布的白銀兌換券的商品。但當時西方向中國的出口貿易的基本趨勢是以毛織品取代西伯利亞皮貨，呢絨基本上取代了皮革製品，甚至，在廣州還出現了俄羅斯呢絨與英國毛織品互相競爭的局面。自1844年起，俄羅斯呢絨確實已經出現在廣州地區（但我們不知道其首次出現的時間），它是經過北京、蘇州（呢絨產品交易的主要集散地）、南京和杭州等地輸往廣州的。<sup>①</sup> 這樣一來，17—18世紀以廣州貿易為中心的中外貿易，牽動了世界白銀和其他貨幣的大流動循環，西方四處籌集白銀以採購中國商品，或將西方商品銷往中國以賺取白銀，使中國既賺取了白銀又復外流，形成國際貿易的雛形。

不過，以上事實也清楚地說明，無論鴉片在中國的購銷量有多大，都不可能完全解釋中國白銀的輸入和流出。我們應該認識到，鴉片並不僅是中國白銀外流的標誌或途徑，而更應是中國白銀進出口數量轉向的原因——鴉片是西方用以榨取中國白銀的百年“肮髒交易”，而賺取白銀是中國為支付鴉片進口費用而被迫採取的下策。當然，中國的白銀問題也可能不是主要取決於鴉片的進口，而在於世界白銀市場流通行情、興盛衰亡。

中國白銀的外流開始於1817或1818年，即鴉片進口由平穩期向大舉輸入階段交匯點的具體時間，<sup>②</sup> 這一過渡階段也是兩種現象之間建立真正聯繫的時間。當時，世界白銀產量處於最低潮期（表3），年平均產量從1781—1800、1801—1810年巔峰期的879,060—894,150公斤下降到1811—1820年的540,770公斤及1821—1830年的460,560公斤，而後一個數字更是八九十年前的水平，勉強高於1721—1740年的年平均產量533,145公斤，也明顯低於1741—1760年的533,145公斤。後來，世界白銀年平均產量於1831—1840年間又上升回596,450公斤，但直到1841—1850和1851—1855年間，世界白銀年產量才勉強接近1801—1810年的水平，約在780,415—886,115公斤之間。白銀產量於19世紀初的萎縮已經得到了廣泛證實，在墨西哥的特殊情況下，白銀年產量的下降趨勢也加劇（表3）。墨西哥的白銀開採量從1792—1798和1799—1806年的2,330萬銀圓（鷹洋）和2,130萬銀圓，下降到1814—1820年的1,120萬銀圓，而1821—1827年的年平均產量又下降至870萬銀圓，僅到1828—1833年，年平均產量才微弱上升至1,080萬銀圓。總而言之，全球白銀產量在1801—1810至1821—1830年間下降了48%，而僅在墨西哥一地，白銀產量在1799—1806和1821—1827年間便下降了59%。在此大幅下降的時期，便是鴉片大舉輸入、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的伊始，鴉片的輸入可能就是為了彌補西方世界對於白銀產量下降而造成的白銀渴求，從這個角度來看，白銀的流入與流出並非單純取決於國家法律，而主要由市場決定，市場又受制於戰爭、經濟和政治時局。

① N. Rondot（隆多），*Étude Pratique du Commerce D'exportation de La Chine*（《中國出口貿易的實踐研究》），Paris, 1848, p. 160.

②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1294.

表3 1763—1833年墨西哥金銀年均產量與兌率

年份	黃金	白銀	阿姆斯特丹金銀兌率	年份	漢堡金銀兌率
1763—1769	34,388	11,311,111	1 : 14.67	1761—1770	1 : 14.81
1770—1777	29,339	15,916,876	1 : 14.59	1771—1780	1 : 14.64
1778—1784	25,670	19,452,452	1 : 14.61	1781—1790	1 : 14.76
1785—1791	17,729	18,298,464	1 : 14.83	/	/
1792—1798	15,168	23,316,155	1 : 15.28	1791—1800	1 : 15.42
1799—1806	12,291	21,344,204	1 : 15.35	1801—1810	1 : 15.61
1807—1813	12,712	16,379,279	1 : 15.59	/	/
1814—1820	/	11,259,724	1 : 15.32	1811—1820	1 : 15.51
1821—1827	/	8,753,328	1 : 15.84	1821—1830	1 : 15.80
1828—1833	/	10,835,115	1 : 15.90	1831—1840	1 : 15.67

資料來源：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1343.

### 三、拉美的白銀生產與廣州貿易市場

墨西哥白銀生產量的凹形趨勢，必然會引起西方世界向持保守態度的一種傾斜。這種傾向特別強大，那就是白銀的減產在任何地方都從來未被黃金生產的增長量所平衡。完全相反，採金業也處於頹勢。當然，金銀生產動向並未準切地同步，而且差距還不小。其實，拉美黃金產量自1770年起開始下降，也即白銀生產驟降的40年前，由1741—1760年的年均產量24,610公斤減少至1761—1780年的20,705公斤。其最低的生產水平是1811—1820年的11,445公斤，這個低谷比白銀最低產量的時間要早十年。不過，黃金的世界年產量從1820年代起便強勢增長，於1821—1830年增至14,216公斤，後來於1831—1840年又增至20,239公斤。在這一階段，黃金在貨幣市場上佔42%份額，而白銀只佔29%。拉美白銀年產量後來又重新從460,560公斤增至496,450公斤，並於1841—1850年增至創紀錄的54,7590公斤。然而，這種差距並未阻止金銀價格在1800—1830年同時疲軟跌落。與產量增長相伴而生的是，白銀生產不可能大幅度跌落，也不可能大幅改變長期以來其與黃金比價的總趨勢，更何況黃金產量在多數情況下，其絕對數字是減產的。黃金價格與白銀相比仍在持續飆升，唯有其兌率在1811—1820年於漢堡短暫地從1 : 15.61下降到1 : 15.51，或者是在1814—1820年於阿姆斯特丹從1 : 15.59下降到1 : 15.32。所以，其兌率接近於美元所含371.25噸純銀的十五分之一。<sup>①</sup>從理論上講，人們可以無限次地降低兌率，一直到金幣從流通領域中消失為止。在1820年之前，很可能是從1810年開始，這種投機操作（劣幣驅逐良幣）又受到了美國自1797年重振金本位、停止可兌換英鎊策略的刺激。<sup>②</sup>英國1816年通過《金本位制度法案》（*Gold Standard Act*），在法律形式上承認黃金作為貨幣本位來發行紙幣，至1823年5月1日全面實施，從而激起了大量黃金流入英國。

① J. L. Laughlin（勞格林），*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國金銀兩本位利的歷史》），New York: D. Appleton, 1897, p. 21.

②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1204。

1800—1814年，由於英國黃金外流，黃金被許多人窖藏起來以致在流通上出現問題，所以被迫中斷黃金對英鎊的兌換，不得已部分地選擇白銀，尤其是軋有印記的銀圓。英國於1810—1811年間共從中國賺取250萬枚銀圓，被迫更多地以白銀為信貸本位。當時黃金與白銀的兌換率持續高企，波斯頓馬薩諸塞銀行（Bank of Massachusetts）的庫存現金、英國軋製金幣的發展、墨西哥白銀產量的比較，以及白銀的進口與出口數量都證實了黃金和白銀的兌率高達1：16。<sup>①</sup>當然，這種兌率在不同的國家中總有差異：1821—1830年漢堡的金銀兌率為1：15.80；1826—1833年阿姆斯特丹的金銀兌率為1：15.89；美國在這些時間之前的金銀兌率為1：16。<sup>②</sup>

金銀之間這種高兌率的後果，便造成白銀的大量聚集，它恰恰就是當時中國輸入白銀最多的國家——美國。美國在1796—1825年的30年間共向中國提供了8.930億銀圓的白銀（英國當時只向中國輸出121,860銀圓，比美國少近5倍）。實際上，到20世紀上半葉，金銀之間的貿易匯兌平均價與貨幣匯兌平價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其中，貨幣匯兌平價自1792年以來便一成不變地為1：15，而貿易匯兌則為1：16，即是說，當時只要用15兩白銀就可以購買1兩黃金，然後再在市場上每倒賣會獲得16兩白銀，當中便有1兩白銀的賺頭，收益約6.66%。然後再用另外15兩白銀買現鈔，還能賺得1兩黃金，再賣出去還能再賺1兩黃金。根據錢幣標準定義，1個銀圓含371.25喱（grain，英美舊時重量單位，約合64.8毫克）的純銀（銀幣中含有其他雜質）；每個墨西哥鷹洋（約10個銀圓）含247.50喱的純銀；1個金美元（它實際上並不真正存在）只含24.75喱純銀。<sup>③</sup>

美元在1826—1833年的發行，已經達到了其初始階段的10倍之多，僅在1817—1825、1826—1833年間就增長138%。而同一時期墨西哥白銀產量僅為其初始階段的半數。這樣就打亂了墨西哥白銀進出口之間的平衡，它於1817—1825年之間共形成總值2,121,900美元的白銀逆差，到1826—1833年才轉為順差，其收入與軋製銀幣的數目相同——2,275,697美元。但銀行儲備金的直線下降反映了貨幣市場的緊張情況，這就迫使金幣的製造於1834—1840年間增長400%，幾乎趕上了銀幣的軋製量，這是由墨西哥於1834年《製幣法》產生的直接後果。與本文有關的最重大事件，當為在美國發生的白銀滯留事件。美國向歐洲供應的黃金比較多，向亞洲特別是中國供應的白銀較少。它們在美國國庫中各自所佔的份額，黃金於1817—1825、1826—1833年間分別從680萬美元跌落到170萬美元，白銀從500萬美元跌落到100萬美元。在這兩個階段，美元的總額是34,227,746元和12,107,459元，其中共有6,120,033美元流向中國。<sup>④</sup>

①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1345.

②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p. 1343-1344.

③ 這是每年發行美元的平均數，對於墨西哥的產品來說則為鷹洋（銀幣）。這是根據勞格林（J. L. Laughlin）的《美國金銀兩本位制的歷史》（*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1897）第249-250頁（軋幣的數目）而得出的結論。

④ J. L. Laughlin（勞格林），*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國金銀兩本位制的歷史》），New York: D. Appleton, 1897, pp. 62-70; T. Pitkin（彼得肯），*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貿易統計展望》），Hew Haven: Durrie & Peck, 1835, pp. 155-156.



## 五、歐洲和西屬美洲白銀出口的危機

歐洲白銀出口危機和白銀產量下降，僅發生在歐洲發生軍事衝突和經濟危機時期。在1770—1777年間，英國輸出的白銀從1.7330億銀圓下降到6,120萬銀圓；歐洲大陸國家的白銀輸出也減少至105,200,000銀圓，歐洲白銀供應的困難程度，在歐洲“七年戰爭”期間也未加緩和。相反，從1763年起，東印度公司又大舉使用了印度這個中轉站來輸入和輸出白銀。<sup>①</sup>這一年，東印度公司用盧比從印度馬德拉斯（Madras）向廣州輸送了610,177銀圓的白銀，而從英國僅僅輸送124,000銀圓到廣州，威廉堡（Fort William）政府於1769年致廣州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信中寫道：“我們要把與中國的貿易發展到最高水平，這是我們心中最重要的目標。這一切並不僅僅是由於明顯可見的利益，而且我們很想在那裏獲得優勢地位，並使歐洲的其他國家失去了染指該市場的勇氣。但從國家的觀點來看，豐厚的收入能預防在中國出現缺乏充足白銀資本的局面，以供那些駛往那裏的商船填滿船艙的貨艙。”但英國在這幾年為廣州貿易輸出的白銀水平很低，徘徊在80—90萬銀圓之間。<sup>②</sup>歐洲白銀缺乏的情況，甚至在戰後恢復與和平時代也出現，這種情況在阿姆斯特丹、漢堡與德國其他地方以及倫敦都出現過。

東印度公司經歷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最終使其白銀供應癱瘓。此時恰逢歐洲大陸走私猖獗，攪亂了英國自中國進口茶葉的銷售，故也影響了其白銀銷售。

東印度公司的第二個危機時期，比前一個時期更為嚴重。英國在這一時期既與西班牙，又與荷蘭發生了衝突。荷蘭放棄了其傳統的中立立場——因為荷蘭曾是18世紀的英國貿易和財稅收入的生命線之一，這相當於一場對於傳統結盟對象的顛覆。英國一時之間再也找不到可以借貸的債主了，特別是白銀貨幣的債主，法國和美國的放債人因此乘虛而入地躋身於英國白銀債務的債主之列。英國的印度殖民區也無力再向廣州提供更多的白銀，甚至於在1779—1785年之間，英屬印度向廣州輸送的白銀竟然下降為零。<sup>③</sup>這一切的危機在凡爾賽條約簽訂之後仍在持續。東印度公司廣州董事會始終缺少銀圓。在1783年，英國在廣州的銀行的白銀儲備金只有8,000英鎊，其中只有2,800銀圓。<sup>④</sup>

長期以來，英國銀行對廣州的白銀供應都是直接通過墨西哥來完成的，而且在兩個多世紀中都經由大帆船航路來維持，這條航路經過中太平洋，借助於東北信風將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與菲律賓的馬尼拉聯接起來，<sup>⑤</sup>英國大部分的白銀再從菲律賓乘西班牙帆船輸往中國的廈門，或是乘許多往來於菲律賓群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中國帆船運輸。這些中國帆船去時運

① H. B. Morse (馬士),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Vol. 5,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p. 107-139.

② H. B. Morse (馬士),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Vol. 5,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145. 本譯文由作者自行譯出。

③ Charles Wilson (威爾遜),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18世紀的英德貿易與財政》),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170-182.

④ J. Clapham (克拉彭),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odern Britain* (《近代英國經濟史》),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217.

⑤ P. Chaunu (肖努), “Le galion de Manille (《馬尼拉大帆船》),” *Annales* (《年鑑》), Vol. 6, No. 4 (1951), pp. 447-462.

載中國商品，形成了西班牙船返船航時的裝艙貨物，回程是運載白銀和其他西洋貨。據初步統計，它們在18世紀共從歐洲運出10.7—21.2億銀圓。每年都有500—600萬銀圓由墨西哥大帆船經菲律賓運往中國和東印度。我們再從中加上來自歐洲和美國運去的3.06—3.30億銀圓。這樣一來，中國於18世紀就從西方世界一共輸入5億銀圓，基本上相當於英國的20.5億登記英鎊，也就是墨西哥於1719—1833年之間生產的白銀15.7億鷹洋的30%。<sup>①</sup>據估計，中國每年都會從菲律賓獲得1,500萬英鎊的收入，約合280萬銀圓。荷蘭每年都向菲律賓發送一艘1500噸位的三桅貨船，其中裝載的白銀約合1,800—2,000萬英鎊，即相當於330—370萬銀圓。在1700—1815年的115年間，西方輸往中國澳門和廣州的銀圓多達34,500億枚。例如，在1699年間，共有三艘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在等待從馬尼拉駛往澳門，共攜帶100萬美元以採購中國絲綢和茶葉等商品。此後，馬尼拉的帆船每年都到訪澳門，每船都裝載150—200箱銀圓，每箱約3,000枚，即總共為45—60萬銀圓。我們還應該再從中加入駛往廣州和廈門的中國帆船運輸的白銀數量，這樣算來，便是上述數字的兩三倍了。所以，中國在這115年間進口的銀圓總數多達9—12億，或者是13.5—18億。這個數值有很大的商榷餘地，但中國於18世紀每年平均輸入150—180萬銀圓，還是十分確切的。1700—1815年這115年內，一共進口1.7—2.1億銀圓，倒是符合事實。<sup>②</sup>

西屬美洲銀礦生產的白銀，一方面經過大西洋和印度洋，另一方面通過太平洋而被運往“廣州—澳門”。這樣一來，中國廣州的對外貿易便將世界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與大西洋）和亞歐美三大洲聯繫起來。正是由於“廣州—澳門”貿易中的白銀供求關係，才形成了東亞的早期世界商貿市場。白銀交易與世界貿易市場的主要支點是墨西哥、安的列斯群島、印度、菲律賓、中國的澳門與廣州，歐洲最多也只不過是扮演了一種白銀周轉中心和使用白銀買賣中國商品的中轉站。白銀不僅溝通了中歐、中國與西屬美洲，以及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交流，也使歐洲貿易向菲律賓群島擴張，東印度公司也利用了這批白銀從事廣州貿易。墨西哥利用其白銀鷹洋到印度和中國去採購商品，歐洲卻是通過其商品而獲得中國白銀。所以，西班牙與法國提出，任何輸往印度和中國的白銀，都必須首先經過歐洲。因為他們認為歐洲的貿易公司開闢了所有商品的流通渠道，從而供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口；而墨西哥通過向中國和印度出售白銀而採購那裏的絲綢與棉織品，會有損這兩種產品在歐洲的生產，<sup>③</sup>而且墨西哥在東方出售白銀，美洲大陸不會獲得任何利益。這種觀點其實有害於當時世界市場的形成。西班牙後來要求直接與菲律賓進行貿易交流，不再容忍通過大帆船而從事的與菲律賓和中國的這種所謂的“邊緣貿易”了。

西班牙決定重啓其與遠東的直接聯繫，是繼菲律賓貿易公司於1733年失敗的30年之後，維亞納的弗朗切斯科·列昂德羅（Francisco Leandro de Viana）在一批經濟學家的鼓動下，決定扭轉菲律賓那不利的貿易形勢，向馬尼拉派出了快速護衛艦布恩昆塞爵號（*Buen Consejo*），並在此後直至1783年，共向菲律賓的加的斯（Cadix）派出過13艘商船，<sup>④</sup>進而在菲律賓創建了一家新的外

① Louis Dermigny (路易·德爾米尼),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 Impr. Nationale, 1964, p. 754.

② Louis Dermigny (路易·德爾米尼),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 Impr. Nationale, 1964, pp. 753-754.

③ Louis Dermigny (路易·德爾米尼),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 Impr. Nationale, 1964, pp. 754-755.

④ Louis Dermigny (路易·德爾米尼),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 Impr. Nationale, 1964, p. 193.

貿公司，繼承了在1784年被解散的那家公司。新公司從事西班牙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這些船舶駛往馬尼拉時要經過好望角、印度洋或美洲，返程時則必須經印度洋而到達加的斯。這些船舶都負責運送銀圓和軋製銀圓的原料。對於銀行來說，銀圓是為了鞏固它自己的地位，從政府處獲得進口白銀和銀圓的壟斷權。而確保這種壟斷權的手段，便是破壞大帆船交易並使白銀自阿卡普爾科大量外流。在“阿卡普爾科—馬尼拉”航線開通的同時，新公司又與中國內地，特別是與“廣州—澳門”和廈門建立了直接貿易交流關係，還向中國派遣了大批營銷商。<sup>①</sup>

新公司的大班們既想經營印度商品，又意圖販運中國商品。他們從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孟加拉和加爾各答等地開始經營活動，向馬尼拉發送葡萄牙商務船舶。<sup>②</sup>除了白銀之外，西班牙人不再提供其他任何商品了。這樣一來，歐洲商船從廣州又得不到充分的商品供應，這些商品的一部分將用在廣州的總兌票據支付上，故他們只好到印度去，船上裝滿紅酒、燒酒、鐵器、胭脂蟲鮮紅染料和軋出銀圓的原料，故它們每次航行都會帶去價值60萬銀圓的商品。

## 六、美洲—歐洲—廣州—澳門：白銀流通的三大角

美國是如何為其在“廣州—澳門”貿易提供資金的？他們直到當時為止，都是用白銀支付貨款的，白銀與其他貨幣的競爭程度大約在66.73—75%之間。但中美貿易於數年之間明顯走下坡，他們商船的流動量於1821—1825年間為37艘、14,044噸位，到1826—1830年卻只有9艘和17,600噸位了。這就是說，在總噸位方面共下降17%，而最明顯處於其低峰期的是在1826年（19艘船、7,034噸商品）與1825年（42艘船、16,1150噸位）之間。<sup>③</sup>

英國方面，在1821—1825年間，東印度公司只發出了21艘船和27,287噸商品。美國國家船舶公司發往廣州的船舶分別為48艘船、31,500噸貨物，以及30艘船、19,913噸貨物，這就是說在貨物噸位上共增長14—58%。儘管這些船舶中的貨物五花八門，但白銀和銀圓始終佔據主導地位。<sup>④</sup>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對於西方人來說，廣州貿易越來越被納入到了一種轉賑和補償的結算體系之中，而且這種體系從世界的一端擴展到了另一端。根據當時中國的貿易餘額條例，白銀只有在歐洲商船回運貨物時才會出現。當時清朝政府深受白銀外流之苦，而且又沒有任何辦法能阻止這種趨勢。中國白銀的外流，就如同鴉片輸入中國一樣，在清朝基本國策上是被嚴格禁止的，至少在開始階段如此。中國使用的是銀錠（sycee），它未被錢幣化，在理論上來說是純淨的白銀，可以作內部交換和交納賦稅使用。清政府於1809和1814年兩次禁止在對外貿易中使用銀

① W. L. Schurz (舒爾茨), “The Royal Philippine Company (《菲律賓皇家公司》),”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 No. 4 (Nov 1920), pp. 501, 506-507.

② H. B. Morse (馬士),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Vol. 2,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122.

③ Louis Dermigny (路易·德爾米尼),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 Impr. Nationale, 1964, p. 1346.

④ H. B. Morse (馬士),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Vol. 3,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p. 128-129.

錠，1809年的詔令同樣還禁止金錠出口。<sup>①</sup>但廣東總督於1817年又重新允許使用銀錠，不過要逐箱地檢查裝載有近150萬兩錠銀的、運往加爾各答的錢櫃，1818年，中國銀錠本身又面臨受禁的威脅。清政府對於白銀日益嚴重的外流感到焦慮不安，甚至連夷族人也開始騙取清政府的白銀，而他們本來的角色卻僅限於向清政府提供白銀。清朝戶部最終還是放行白銀外流了，其條件是每艘船運走的白銀數量不能超過其來時艙貨價值的十分之三。但清政府的限制或禁止都不具有很大的實效作用。中國白銀外流的走私絲毫不遜色於鴉片內流的走私，而且它們大多是在澳門或伶仃洋完成交易的。正如廣州夷館的某位大班於1812年所寫道的那樣：“中國所有的貴金屬外流，在理論上都完全受禁，銀錠肯定受到了最嚴格的監視。但清政府的官吏們的貪婪行為始終都是固疾，銀錠和白銀借助於一定數量的酬金，經由負責阻止白銀出口的官吏們的活動而實施，白銀的外流從未中斷過。”<sup>②</sup>其後，官吏們與行商達成了協議，為了預防任何事故，白銀絕不允許運出廣州城或黃埔港，而僅僅自澳門或伶仃洋出口。當時在伶仃洋，人們僅通過在走私團夥中有固定據點的商賈尋求裝有鴉片供貨的帆船，進而轉港運輸。這樣一來，北京當局也最終明白了（廣州當局很早就明白了這一切），有兩大問題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如果說中國清朝皇帝1822年的詔令僅僅重複了禁止出口銀錠之事，那也引起了對內部交易的制約，尤其是造成了對在產地採購茶葉時的手頭拮据。清政府1830年的一道詔令又明確地宣佈說，走私出口白銀要被判處雙重罪，因為這同時也會引起白銀的外流和鴉片的急驟進口。清朝政府立法，要求廣州行商們在他們與外國人的貿易交往中，只能接受商品交換，不允許使用白銀。由於廣州地區的商賈喜歡使用外國銀圓或鷹洋，所以行商們使用銀錠來購買外國銀圓。使用外國銀圓導致了福建和其他地方供採購茶葉的白銀的匱缺。<sup>③</sup>但中國這種出現得很晚的覺醒，仍可以完全遏制事態的發展。在1830—1840年間，廣州夷館共從中國運出26,618,815個現鈔銀圓和2,554,205個銀錠。因為白銀在中國的定價較低，所以黃金與白銀的兌換比例在那裏一直上升到1：18，到1830—1840年間還更多；而當時在漢堡，同樣的總率則為1：15.80左右，在阿姆斯特丹和紐約為1：16左右。<sup>④</sup>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中國對黃金的定價要比西方高得多。這是由於西方人獲取的黃金在18世紀時就已經不大起作用了，他們掠奪的白銀在六七十多年之後，也已經不大起作用了，中國的黃金產量大幅下降，而其傳統上的黃金供應者交趾支那或印度尼西亞的黃金也大幅度銳減。這其中與越南阮氏王朝勢力的上升與由嘉隆統一安南王朝事件關係密切。菲律賓的棉蘭老出產金沙和白銀，但那裏在1841年也只能向中國出口折合721,000法郎的黃金和985,000法郎的白銀。<sup>⑤</sup>我們對於這些現象的起源幾乎一無所知，但其後果卻不容置疑。如果說黃金的昂貴在鴉片的推動

① H. B. Morse (馬士),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Vol. 3,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p. 128-129.

② H. B. Morse (馬士),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Vol. 3,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187. 本譯文由作者自行翻譯。

③ H. B. Morse (馬士),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Vol. 4,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60.

④ Yang Lien-sheng (楊連陞), *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中國的貨幣與信貸簡史》),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48.

⑤ J. Mallat (馬拉), *Les Philippines, Histoire, Géographie, Moeurs, Agriculture, Industrie et Commerce des Colonies Espagnoles dans L'Océanie* (《菲律賓的歷史、地理、風俗、農業以及與大洋中的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 Vol. 2, Paris: A. Bertrand, 1846, p. 345.

下，已經嶄露出將白銀從中國驅逐出去的苗頭，那麼白銀的稀缺再加上它與銅幣相比的升值，中國貨幣體系便由此而完全被打亂了。中華帝國在白銀方面究竟匱缺到了甚麼程度呢？我們現在尚不完全瞭解西方從中國賺取的白銀數量，也無法知道它們是通過陸路還是帆船貿易而賺取到的，更不知道中國的白銀生產水平，甚至不知道中國通過中俄之間的恰克圖（Kiakhta）貿易而獲得的白銀數量。但中國在廣東貿易中缺乏白銀，在1830年前後尤為嚴重，這是不爭的事實。英國政府就曾經抱怨：“廣州在本貿易季特別缺少銀圓，這是中國在近幾年來大量輸出白銀而造成的必然惡果，況且在那些年間，又缺少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中國人直到此時，都頑固地拒絕接受除了西班牙的舊軋銀圓之外的其他銀圓。自從西班牙的殖民地獨立以來，其軋製的銀圓也急劇地減少。”但商賈們卻要在交納5.5%的銀錠補貼之後，才能把它們輸往倫敦。<sup>①</sup>清政府掌握的儲備銀數量一直在銳減，從雍正時代的6,000萬兩銀下跌到了1850年的800萬兩。<sup>②</sup>清政府國庫到底空虛到甚麼程度呢？我們應該從其後果，而不是到國庫空虛本身中去探討原因，這些原因大都應歸咎於銀銅幣的貶值。

清朝官方的金銀兌率於1647年被定為每兩白銀兌換1000文的1吊銅錢。商業行情的漲落從未超過20%上下。即使自康熙於17世紀末復興銅幣市場以來，貨幣市場也始終如此。

## 七、鑄造銅幣——清朝緩解白銀危機的權宜之計

清王朝面對中外白銀危機，曾一度採取傳統幣制——鑄造銅幣。這在中國貨幣史上雖為一種倒退，但也不失一種權宜之計，它為應對白銀危機作出過重要貢獻。不過，銅幣主要是發行於國內市場，成為銀圓在國內市場的替代幣，從而使白銀被集中用於國際貿易。中國不僅擁有悠久的銅幣製造史、嫺熟的鑄銅幣技術、先進的鑄造設備和專業的鑄幣專家技工隊伍，也蘊藏有比較豐富的銅礦（特別是在雲南），更有銅幣廣泛流通的國內市場。

雲南銅產量在1754—1772年間每年平均增長10萬擔，在1773—1820年間又年平均增長13萬擔。但在1823—1858年間，又下降到年平均年產量8—10萬擔，當時由於國內銅產量減少，白銀使用增多，從而導致清王朝白銀庫存的下降同樣高達100%。這種銅產量的下降，恰恰發生在人口於30年間增長21.64%的關鍵時期，中國人口於1820年達3.534億人，到1850年又達到4.299億人。<sup>③</sup>如此眾多的人口，無論對於金幣、銀幣、銀錠或銅幣，甚至是各種紙幣和兌票的消費，其數量都相當驚人。然而糟糕的是，當時中國貴金屬之匱缺，再沒能得到外國的補償了。

中國傳統的銅料供應國日本在1685—1720年間所扮演的角色，到此時已經僅僅保留着一種歷史的記憶了。長崎的帆船往來又進一步地加強了銅料的產量的下降，使之從1799—1807年間的年平均1,000擔，下降到1817—1825—1833年間平均780擔—800擔。對於西方人來說，這本來是一個接力日本銅供應者的最好時期，這可推動發展他們在向中國大舉出口鴉片的同時，也向中國出

① H. B. Morse (馬士),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Vol. 3,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259, “英政府1831年報告”。本譯文由作者自行翻譯。

② Ho Ping-ti (何炳棣),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368—1953年的中國人口研究》),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16.

③ Louis Dermigny (路易·德爾米尼),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 Impr. Nationale, 1964, p. 1353.

口銅的貿易。但過去他們由於沒有找到一種合適的價格，故未這樣做，如今也並未這樣做。美國人於廣州進口的一大部分中國銅又被轉口消耗於日本。從而造成了銅幣的減少。美國人於1828年於其從廣州進口的3,237擔中國銅中，向印度轉口銷售2,000擔，價值5萬銀圓；他們於1829年從中國進口銅的價值折合80,896銀圓；在1832—1833年間，他們每年約從中國進口銅10,799擔，價值215,990銀圓。<sup>①</sup>

但歸根結底，中國銅危機主要不在於走私出口，而在於銅產量的嚴重不足，而且這種現象從乾隆時代就已初見端倪。乾隆初年，每文銅錢的直徑為1.10法寸（pouce，每法寸約合27.07毫米），但後來卻慢慢變小變薄了。到1790年左右，銅錢重量也減少至原來的8.5—7.5%。到了嘉慶初年，也就是19世紀初，新銅寶大部分的重量只有乾隆初年的1—2%，僅有30—40%的銅錢達到1兩的10%，其餘大部分均不足法定重量。到道光年間的1820—1830年，假幣泛濫，官制銅錢也只有1兩之重的5%。自1850年的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情況更加惡化。太平軍的勢力擴大到長江流域，切斷了雲南銅的運輸通道，從而迫使清政府改用鐵幣和紙幣。

## 八、中國白銀繼續外流以及拉美白銀的流入

銅幣雖為中國傳統幣制，但在18世紀時已是過時之物。雖然它可以暫時緩解清政府的白銀危機，但由於無法用於外貿，只能成為地道的“內銷”貨幣，其價值便直線貶值，對於貿易全球化和貨幣國際化尤其緩解世界白銀危機均無益處。與此同時，白銀價格不斷虛高，在一段時間內，銅幣實際上被排斥於流通領域之外，人們只能把它們囤集或窖藏起來或出口，以至於到1837年，中國每年理論上的外流白銀高達6,000萬兩，其中3,000萬兩來自廣州港，1,000萬兩來自福建港和浙江港，2,000萬兩來自天津港。<sup>②</sup>

白銀虛高升值和銅幣直線貶值，導致生活費用上的通貨膨脹，明顯是構成當時中國經濟生活崩潰的一大原因。

在1799—1807及1826—1833年間，中國白銀產量增長36.90%，而其價格卻貶值到了原點，甚至降到了1.14%以上。僅僅在1808—1816年間，才出現了白銀產量增長11.52%和價值增長10.69%的繁榮期。當時清朝在稅務方面更依靠白銀，稅賦都是以銀錠為單位而結算和支付的。

為了尋求對中國白銀問題種種亂象的解釋，我們還必須到美洲銀礦方向去尋找原因。巴西白銀產量自1770年以來，尤其是自1785年起，一直在持續萎縮，甚至下降33%。在此前的1770—1777年和1778—1784年兩個階段，巴西白銀產量僅下跌14和12%；在1799—1813年間，竟下降到了1778—1784年間的半數。墨西哥的白銀產量於1799年之前都在持續穩步上升，僅在1785—1791年間才形成一個穩產期。但其產量自1800—1801年起，則一直減少至2,100—1,790萬圓和1,590萬圓；到1821—1827年間，其產量則低於1792—1980年間白銀年產量水平的三分之一，也就是1807—1813年產量的近一半。這樣就導致了金銀幣比值或兌率的變化，在1830—1833年間，金銀的兌率甚至達到1：16。白銀產量減少，自然而然地在市場上較為稀見（況且美洲自己也囤積了

<sup>①</sup> 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學報》（北平）1934年第6卷總第579（本冊第168）頁。

<sup>②</sup> H. B. Morse（馬士），*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國的對外關係史》），Vol. 1, London, New York (etc.):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1918, pp. 202-204.

大量白銀，以備不時之需），但此時它卻成為必不可缺的國際貿易貨幣。西屬美洲白銀產量的銳減，既源於白銀礦開採的困難，又與當地的戰爭動亂和經濟危機有關。

當時在整個歐洲，特別是在英國，也爆發了白銀危機。由於缺乏黃金，人們被迫轉向使用白銀作為流通貨幣。英國從葡萄牙白銀供貨，轉向了追求西班牙的白銀供貨商，而英國人過去就曾為此與西班牙爆發戰爭。我們很難評估歐洲自西屬美洲獲得的白銀數量，其中許多白銀是通過安第斯山脈（Andes Mountains）地區轉運的。因為在1810年左右，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發生了導致世界秩序大動蕩的革命。但這一切反而有利於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對英國人的開放。英國人於1811年進入美洲資源開發之列，同樣在1811年，英國也進入了美洲西屬殖民地的大部分白銀產地和白銀轉運港口，如烏拉圭的蒙特維的亞（Montevideo）、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智利的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古巴和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特別是在墨西哥，因為墨西哥銀礦蘊藏量雖然豐富，但當時均被水淹，需要多年改建方能恢復生產。<sup>①</sup>

此時，世界白銀產量的下降，卻又遇到了英國戰爭軍費開支的巨額增長。英國軍費從1803—1806年的每年平均開銷140萬英鎊，增加到了1807—1810年間的年均670萬英鎊，到1811—1814年間，年均開支高達1,920萬英鎊，到1808—1815年間達到1.13億英鎊。<sup>②</sup>這樣一來，銀礦的枯竭，包括英國軍費在內的各項開銷的增加，必然會導致金銀兌率的跌落，從而迫使英國人轉向歐洲大陸尋求白銀。在數周內，由銀行發行的銀圓便一枚不剩。

歐美的這種白銀生產背景，直接影響了亞洲的國際貿易市場，因為亞洲在傳統上更喜歡白銀。東印度公司在一切可能範疇內竭盡一切能力謀劃賺取白銀。中國當時只能獲得少量白銀，遠不能滿足茶葉貿易發展的需要。我們對於西方向中國和印度出口金屬銀以及商品，與茶葉的進出口作一番比較頗能說明問題。中國出口茶葉的總擔數，與馬士（H. B. Morse）提供的數字之間存在着差距。這裏僅僅是指貿易投資的白銀數目（表4）。

事實上，並非是英帝國獨自面對這場牽動全域的白銀危機，葡萄牙也正處在從使用白銀到發行紙幣的過渡階段。葡萄牙紙幣發行始於1797年7月，當時恰逢其停止用黃金兌換白銀的四個月之後。該國軋製金幣數量自1770年左右便不停萎縮。它從1763—1769年的年平均軋製7.273億枚輔幣，降到了1778—1784年的3.634億枚，在15年內被腰斬半數。<sup>③</sup>

① F. Crouzet (克魯宰特), *L'Économie Britannique 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英國經濟與大陸的包圍》), Paris, 1958, pp. 184-185.

② Norman J. Silberling (西勒貝林), "British Prices and Business Cycles, 1779-1850" (《1779—1850年周期內的英國物價與商業》),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經濟與統計學報》), Vol. 18 (1930), pp. 159-268.

③ Louis Dermigny (路易·德爾米尼),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 Impr. Nationale, 1964, p. 1207.

表4 中國與印度收入的白銀與商品對照表（單位：由白銀折合成英鎊）

年代	印度		中國		茶葉
	白銀	商品	白銀	商品	
1778—1784	5,210	357,450	0	121,499	56,640
1785—1791	124,719	368,198	512,491	410,133	135,381
1792—1798	139,888	539,977	164,109	656,527	147,357
1799—1805	760,263	825,387	186,776	1,038,013	203,133
1806—1811	33,360	994,352	0	963,112	206,996

資料來源：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324、350—351頁。

從廣州的方面來說，沒有任何白銀輸入中國，其前後三年也呈現出白銀流動量的疲憊；從印度一方來講，在1806年之前，白銀的流入卻始終持續不斷。但作為白銀危機的後果，那裏也出現了銀價的暴跌。中國在印度半島作出了犧牲。因為英國威靈頓（Wellesley Wellington，1769—1852年）政府於1799年命令將未來應該從英國運往“廣州—澳門”的白銀，都改道運至印度，以防止法國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年，拿破侖三世）可能對印度半島即將發動的攻擊。在廣東政府的抗議下，英國政府的這項決議才被撤銷。<sup>①</sup>所以，中國在1785—1811年間，只獲得價值6,043,637鎊的白銀，印度半島卻獲取價值折合73,722,687鎊的巨額白銀。在商品方面，情況正好相反，中國在同一段時間內共從商品中獲利價值20,511,389英鎊的白銀，而印度半島只從中獲取可折合18,030,740英鎊的白銀。後來，中國白銀收入又迅速增加，在1778—1784至1799—1805年這個時間段中，共暴增754%，而印度卻只增加1.3%。中國變成英國工業產品的最理想銷售市場，其銷售量要比中國茶葉的出口量多得多。英國賺取的利潤折合成白銀，在1785—1791年間增加237—139%，在1792—1798年間增加60—90%，在1799—1805年間增加58—38%。<sup>②</sup>由此可見，在18世紀末的時間，洋貨產品在中國銷售量龐大，中國商品出口反而減少。這一切也與中國的白銀危機休戚相關。

這樣算來，在27年間，英國輸往廣州的貨艙中共裝載了折合2,050萬英鎊白銀的商品和價值600萬多英鎊的白銀，這與18世紀輸往中國的90%白銀和10%商品局面完全相反，也與1760—1770年間分別佔60—70%和30—40%的形勢大相逕庭。中國最大的客戶們只向它提供越來越少的白銀。英國人的這種行為，後來又由美國人繼承，而美國人的廣州貿易也越來越依靠白銀。

在如此嚴重的東亞外貿貨幣混亂中，英國在華貿易發展速度，明顯與他們躋身於美洲大陸的速度相聯。西方和東南方之間有兩種產品的交易規模是不對等的，西方是毛皮，南方則是白銀。在這方面，有一個關鍵的時間——1797年，我們或者可以說是1795和1797年這兩個時間，也就是在荷蘭的閉關時間，或者是西屬美洲的“開關”時間，毛皮與白銀的交易是不對等的。但這兩件事的原因卻截然不同。英國駛往廣州的商船於1792—1794年間由6艘增加到7艘，最終在1801年增

①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1211.

②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688.



加至36艘，僅在1797—1801年的四年間便增加三倍。其攜帶的白銀數量從1795—1797年的66萬圓增至1802年的2,584,000圓，在五年間又增加了四倍。這與英國的外貿出口數據形成鮮明對照。因為英國外貿從1798—1799年的180—220萬銀圓，下跌到1801年的113,000銀圓。美國人沒有等多久，便在智利和秘魯海岸現身。<sup>①</sup>美國人的活動，在某種意義上，大大地促進了中國在美洲的貿易競爭，特別是白銀貿易活動。

美洲與中國貿易，是從安第列斯山區地開始的，美國人也正是通過安第列斯山脈北區，而獲得為他們提供購買中國商品或輸往中國商品所必需的白銀。他們特別是控制了海地國的貿易，由於海地國以其毗鄰聖多明各（Santo Domingo）開始，進一步便接近古巴，所以從事海外貿易非常便利。在1821—1823年間，美國每年平均有480萬枚銀圓從那裏被運往“廣州—澳門”。但當時由於墨西哥白銀產量正處於低潮期，所以這些輸往中國的白銀來源應該是多種多樣的，這是由美洲國家從作為殖民地而向歐洲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時所獲得的報酬，進而又投放中國廣州的生意上。“歐洲戰爭為美國打了金礦和銀礦之門”。<sup>②</sup>美國人自1806年起，便自阿爾巴尼（Albany）銀行採購了大批銀圓輸往中國廣州。當時墨西哥白銀產量仍處於疲軟期，它從1809年的年產量2,470萬銀圓降到了1812年的910萬圓。美國輸往廣州以從事與中國貿易的白銀量，也從1810年的470萬圓銳減到1812年的180萬圓。<sup>③</sup>

美國與中國從事貿易的波士頓或紐約大帆船是歐洲的“印度船”和阿卡普爾科帆船的繼航者，經歷二百餘年航行，才於1815年結束。大帆船貿易使美洲白銀直接流向遠東，特別是中國，其後又淹沒於歐洲市場裏。當時經西方而輸往中國的運載貴金屬貨幣的大帆船，都要繞過經由非洲的好望角而不是智利的合恩角（Cap Horn）。輸往遠東白銀的數量的變化，證明了這種航向的變化。美洲人在1793—1833年前後與此前40年間，共輸往廣州銀圓103,600萬枚，這個數字幾乎與歐洲在1741—1791年的50年間輸往廣州的白銀103,300萬枚大致相等，而且歐洲自1792年以後只向中國輸送2,720萬枚銀圓。<sup>④</sup>

當時西方在中國貿易的白銀交易和商品交易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75%。事實上，支付方式的差異，僅僅是與經濟“齡期”有關。當英國的工業革命完成時，美國工業“齡期”尚屬未來。它們各自向中國出口的便有“資源”（白銀）與產品之別。中國當時需要進口的商品最多就是金屬（白銀、鉛與錫和紡織品）。<sup>⑤</sup>

① Louis 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 Nationale, 1964, p. 1164.

② M. Wirth（維爾特），*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貿易危機史》），Frankfurt am Main, 1883, p. 387.

③ D. R. Dewey（杜威），*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的財務史》），London, Mumbai, 1903; New York, 1934, pp. 144-150.

④ W. L. Schurz（舒爾茨），“The Royal Philippine Company（《菲律賓皇家公司》）”，*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 No. 4 (Nov 1920), pp. 450-452.

⑤ H. B. Morse（馬士），*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 2,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702.

## 結語

嚴格地來說，國際上的貨幣白銀化或白銀貨幣化是從15世紀開始的。這一切對於當時的東方更為有利，因為西方本身還是更喜歡黃金的，無論羅馬還是俄羅斯均是如此。貨幣白銀化的進程，實際上與貿易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同步，二者互相促進，又互相牽制。實際上，國際貨幣白銀化從東方開始起步，16—18世紀東方市場催生並發展了貨幣的白銀化或全球化，其中“廣州—澳門”這個東方市場的核心區起到決定性作用，不啻是白銀貨幣化和貿易國際化的“孵化器”之一。在16—18世紀，“廣州—澳門”是中西關係和中西貿易的前哨港和目的地，馬六甲、果阿和馬尼拉僅僅成了“廣州—澳門”國際貿易的過道和中轉站。這種貿易編織起亞洲、歐洲和美洲的國際貿易網，促進了白銀貨幣的國際化，從而進一步促成這一地區的社會轉型與國際關係的新格局。伴隨着中西貿易、白銀貨幣化或貨幣白銀化和中外關係的發展，不僅僅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優質產品大量外傳，而且也使西方近代科學的許多產品、思想意識、社會形態傳入了中國，使中國逐漸接受了西來之風，步入了近代社會的征程。

[責任編輯 陳超敏]